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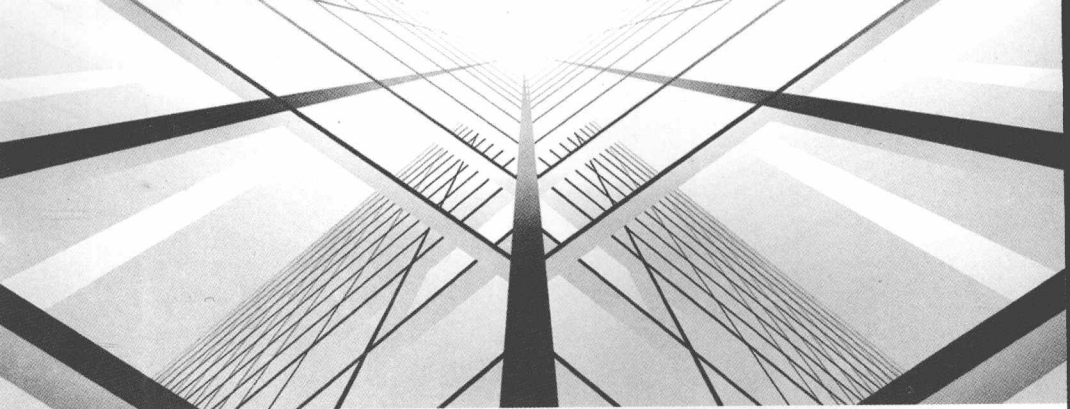


交往自由与 现代艺术

重读阿多诺的审美批判理论及其政治意义

凌海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交往自由与现代艺术

重读阿多诺的审美批判理论
及其政治意义

凌海衡◎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往自由与现代艺术：重读阿多诺的审美批判理论及其政治意义/凌海衡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5004-8043-3

I. 交… II. 凌… III. 阿多诺, T. W. (1903—1969) —美学思想—研究 IV. B83-095.16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8523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特奥尔多·阿多诺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由于他对启蒙和现代性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因此遭到了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当代许多理论家的严厉指责。然而本书认为，阿多诺并非对启蒙理性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实际上，他始终坚持对启蒙进行再启蒙。在抵制工具合理性或同一性思维对具体的、特殊的、非同一性的客体的宰制与收编的同时，他力图通过反思启蒙思想迄今以来所犯的错误、重振非同一性思维和摹仿合理性来纠正人类发展的方向，最终建立主体—客体间的非宰制性的交往自由。但是，由于建构性的主体已经发展成为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下虚弱无力的客体化主体，从而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所以阿多诺更多地还是将变革的可能性与思维活动联系起来，而不是与社会结构的趋势或社会群体的行动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他那里，只有阐释性哲学与现代自律艺术才足以承担起抵制宰制性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现代艺术。后者实际上被视为社会改造和解放实践的典范，因为在艺术中，摹仿合理性被看做是精神性的东西而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而且艺术中的摹仿因素恰恰体现阿多诺的乌托邦理想，即主体—客体间的交往自由。在这个意义，现代艺术就成了解放斗争的典范。

目 录

绪论 当代语境中的阿多诺·····	(1)
一 德国语境中的阿多诺及其理论·····	(5)
二 英语世界里的阿多诺及其理论·····	(8)
三 重估阿多诺·····	(15)
第一章 反思启蒙与拯救启蒙·····	(20)
第一节 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20)
一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批评·····	(20)
二 启蒙与神话的缠结·····	(31)
三 对启蒙的启蒙·····	(40)
第二节 理性的内在辩证法·····	(45)
一 理性的内在辩证法:工具合理性与摹仿合理性·····	(46)
二 工具合理性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53)
三 文化工业与物化·····	(60)
四 抵制物化的可能性·····	(69)
五 阿多诺的进步观·····	(74)
第二章 主体—客体间的交往自由·····	(78)
第一节 客体的优先性·····	(78)

2 交往自由与现代艺术

一	阿多诺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判	(79)
二	客体的优先性	(88)
三	更多而不是更少主体性	(98)
第二节	非同一性与交往自由	(105)
一	同一性思维的辩证法	(106)
二	主体—客体间的交往自由	(112)
三	非同一性的调和状态	(118)
第三章	主体性与实践	(125)
第一节	主体性的发展与变革的可能性	(125)
一	实践纲领的缺失与革命主体的无能	(125)
二	文化工业控制主体的思维	(132)
三	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心理的操纵	(138)
第二节	阿多诺理论的实践潜能及其对实践的反思	(147)
一	阿多诺的革命性主体	(147)
二	实践主体的动机问题	(157)
三	从承认斗争走向交往自由	(165)
四	阿多诺对实践问题的反思	(170)
第四章	现代艺术作为交往自由的典范	(179)
第一节	作为抵抗力量的阐释性哲学与自律艺术	(179)
一	阐释性哲学批判	(180)
二	反对介入性的艺术	(184)
三	自律的艺术	(189)
第二节	现代自律艺术的社会功能	(197)
一	哈贝马斯:通过艺术批评来重新联结系统 与生活世界	(198)

二 韦尔默:作为交往媒介的艺术	(205)
三 莫里斯:摹仿性战栗的政治学	(211)
四 艺术作为解放实践的典范	(216)
第三节 作为摹仿的交往自由	(220)
一 摹仿的定义	(221)
二 摹仿性语言	(228)
三 摹仿:让客体事物自身进行言说	(233)
四 摹仿与艺术	(244)
五 现代艺术中的摹仿与主体—客体的交往自由	(256)
结论 通往交往自由之路	(260)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87)

绪 论

当代语境中的阿多诺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中最负盛名的人物，毫无疑问，当属特奥尔多·维森格伦德·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阿多诺这个德国犹太人是一位充满了艺术禀赋的哲学家、音乐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他那“直面绝望”^①的非同一性哲学对德国乃至世界上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德国批判理论家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Albrecht Wellmer）在评价阿多诺的时候说：“自从叔本华和尼采……以来，还没有哪一种艺术哲学对艺术家、批评家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要比阿多诺的更深远，至少就德国而言。”^②

阿多诺于1903年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阿多诺自幼就有良好的音乐修养，1924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曾到奥地利师从伯尔格（Alban Berg）学习作曲，后来还参加了著名的现代主义音乐家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的音乐创作班子。1926年由于阿多诺对这

① T.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E. F. N. Jephcott (London: Verso, 1978), p. 247.

② Albrecht Wellmer, *The Persistence of Modernity: Essays on Aesthetics, Ethics, and Postmodernism*, trans. David Midgle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1), p. 1.

个维也纳圈子的“非理性主义”感到不满，他离开他们，回到了法兰克福。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他才彻底放弃作曲，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以及社会、文化批评，当然也包括音乐批评。

阿多诺对哲学的兴趣很早就表现了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年仅 15 岁的他就与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一道研读康德，阅读卢卡奇（Georg Lukacs）和布洛赫（Ernst Bloch）的著作。1926 年回到法兰克福之后，阿多诺为了在大学的谋得一个教师职位，开始着手写作大学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chrift*）。起初他写了一篇关于康德和弗洛伊德的论文，遭到拒绝后，他又着手写作《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Kierkega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该书出版于 1933 年希特勒上台的那一天。在苦苦寻求教职期间，阿多诺还与许多当时的左派思想家和批评家交朋友，其中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他最为亲密，也是友谊保持最久的朋友。在霍克海默的邀请下，阿多诺加入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纳粹上台之后，阿多诺辗转来到美国，与早已迁移到那里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人员重新会合，并开始了与霍克海默的亲密合作。这项合作最大的成就，是 1944 年以油印本形式出版的《哲学片段》（*Philosophical Fragments*），即后来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该书的中心论点是，正由于理性放逐了所有非理性的因素，理性自身变成了非理性，从而成了一个盲目的工具，无法反映出自身本来的目的，也无法理解它所作用于其上的物质的特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将这种理性称为工具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研究所。阿多诺也正式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自此之后，阿多诺越来越少从事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地

深入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在此期间，他的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包括他的音乐和文学批评论文集，纷纷问世，其中包括阿多诺的《黑格尔三论》（*Three Studies on Hegel*, 1957）、《否定的辩证法》和《美学理论》。除了以上所说的作品以外，阿多诺其他主要著作还有文化批评论文集《棱镜》（*Prisms*, 1955）和文学批评论文集《文学笔记》（*Notes to Literature*, 1958—1974）。

从阿多诺一生的论著来看，他的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虽然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从辩证法逻辑到报纸上的星象学专栏；从独裁个性到奏鸣曲式；从诗歌的句法到好莱坞电影，等等，无所不及，但终其一生，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哲学讲演《哲学的现实性》^① 到后期的两大杰作《否定的辩证法》^② 和《审美理论》^③，作为坚持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家，他始终坚持抵制工具合理性或同一性思维对具体的、特殊的、非同一性的客体的宰制与收编，力图通过反思启蒙思想迄今所犯过的错误、重振非同一性思维和摹仿合理性来纠正人类发展的方向，最终建立主体—客体间的非宰制性的交往自由。虽然他的思想在不断深化、发展，但在他的所有研究中，他却始终关注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为什么志在解放人类的启蒙最终却使得当代人重新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宰制之中？理性与权力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究竟有

① Adorno, "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1931), trans. Benjamin Snow, *Telos*, no. 31 (Spring, 1977), pp. 120—33; reprinted in *The Adorno Reader*, ed. Brian O'Conno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p. 23—39.

②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中文翻译参见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③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ed.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and trans. Robert Hullot-Kent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中文翻译参见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没有一种不会给人带来苦难的思维方式？有没有一种不遮掩不公的思维方式呢？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人们幸福生活但又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世界？还是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封闭在一个每一种快乐都必然牺牲他人的生活，以至我们根本就无法设想一个没有社会不公的世界？

阿多诺反复思考的，其实还是在于人类的命运。本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启蒙被理解为思想的进步，它总是志在使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成为主人”^①。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人类文明堕落为一种新的野蛮。阿多诺在1964年《否定的辩证法》最后一节《关于形而上学的沉思》中，对自我吹嘘的“优等民族”的彻底疯狂作了这样痛苦的概括：

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业已失败。这一切居然会发生在哲学、艺术和启蒙科学的传统之间，这表明的，远不止是说这些传统及其精神缺乏把握人类并在他们中间引起变化的力量。它更说明了，在那些领域本身里，在那强烈要求它们自给自足的国度本身里，已经存在着虚妄。奥斯威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急迫批判，都是垃圾。^②

正是这种激烈批判的态度和悲观的结论，使得阿多诺的理论以及他本人的命运几经沉浮。

^①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ed. Gunzelin Schmid Noerr;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中文翻译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pp. 366–367. 中译文见第367页。

一 德语境中的阿多诺及其理论

希特勒上台之后，阿多诺和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其他成员先后流亡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回到法兰克福，重建研究所。但是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弗洛姆（Eric Fromm）和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等人并没有回国，而是选择在美国定居。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尔库塞成了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当美国学生运动扩展到西德的时候，那里的叛逆者重新发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的著作。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启蒙辩证法》以盗版形式重新问世，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获得空前的复兴，而阿多诺的年轻助手于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作为对学生的事业的支持者而获得了相当的知名度。几年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成了德国学术界的主流团体。在“实证主义之争”中，阿多诺战胜了批判理性主义卡尔·波普尔（Carl Popper）的德国支持者，而一度占据支配地位的以海德格尔为核心的学派也失去了原有的力量。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批评理论的许多青年弟子们却纷纷公开表示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不满，认为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持一种日益严重的清静无为的态度。1968年，正当学生运动最为激烈的时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了激进学生攻击的靶子，阿多诺本人甚至被指为是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对那些认为自己受了阿多诺本人的号召并征引他的著作以证明自己的行动的正确性的反叛者，阿多诺感到不寒而栗。尤其让这个自由思想家光火的是，在1969年的一次讲座中，几个裸露着胸脯的女

学生打断他的演讲，以抗议家长制作风。这位哲学家深受其辱，于是远走瑞士，到沃里斯度假去了，不幸却在那里去世，享年65岁。

如果说阿多诺的去世使得他本人最终获得了平静与安息，那么在他身后，他的思想却依然命途多舛。更有意思的是，阿多诺的理论所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竟然是来自于自己的学生——如今在思想界中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哈贝马斯。应该说，早期的哈贝马斯虽然有着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总体上还是在批判理论的传统框架中循规蹈矩地工作着。《理论与实践》^①和《知识与人类兴趣》^②等著作明显地显示出阿多诺理论的痕迹。但是就在其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作品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是如何努力摆脱他的导师的影响的了。

显然，《启蒙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一直让诸如哈贝马斯这样一些关注维护批判理论乃至更广泛的现代社会哲学的遗产中有进步价值的东西的思想家感到烦恼。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的研究规划在解决规范性基础的问题上遭到了失败，因此失去了可行性。哈贝马斯的皇皇巨著《交往行动理论》的任务就是要设定一条新的道路，为对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病理的分析提供一个充分扎实的基础，为解放改造指明方向。用哈贝马斯本人的话来说，他的目标在于发展“一种旨在证明其自身批评标准的有效性的社会理论”^③。哈贝马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John Viertel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

②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

③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 xli.

斯对阿多诺关于启蒙辩证法的观念中的总体化倾向表示批判的态度，他认为这使得阿多诺无法将调和的理想及其所有的神学色彩缓和为关于人类自律和责任的理想。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诺并没有公正对待现代性的合理性内涵，第一是因为他未能考虑到，合理性与理论的动力推动科学超越了纯粹技术性地生产有用的知识。由于阿多诺认为这个世界已经全面物化、被全面管制起来的，因此他无法想象出任何抵抗的可能性。第二个缺点在于，阿多诺未能承认合理性起到了法律与道德的普遍性基础的作用。阿多诺激进的理性批判实际上是自挖墙脚，将自己的根基都瓦解了，批判失去了规范性基础。第三，阿多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审美体验的合理性^①。

作为批判理性的继承人，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批评得到了最广泛的引述、尊重，也引起了最广泛的争议。随着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的日益增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延续性似乎被中断了。因为哈贝马斯的著作不仅触及许多老一辈没有表述过的社会政治理论问题，它还重新界定了一些参数，乃至它开启了一条与那些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没有关系的理论家之间的对话的道路。社会研究所的现任所长阿克塞尔·霍内特 (Axel Honneth) 甚至声称，哈贝马斯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之间几乎没有多少共通的地方^②。人们普遍认为，交往行动理论取代了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许多当代同情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重构和复兴的评论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哈贝马斯对阿多诺的批判。就连对阿多诺有较多同情并力图在自己的理论中融合阿多

^①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 113.

^② Axel Honneth, *The Fragmented World of the Social: Essay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Charles W. Wright (Albany: SUNY Press, 1995), p. 86.

诺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的韦尔默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而如今执掌着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内特在对阿多诺的态度上完全继承了哈贝马斯的观点。他甚至认为：“批判理论转向阿多诺的历史哲学否定主义最终标志着，将批判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的努力彻底失败了。”^① 不过，有意思的是，与哈贝马斯敌视法国后结构主义不同，霍内特从后者那里吸取了不少营养，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论。

因此，很显然，哈贝马斯的万丈光芒使阿多诺显得黯然失色。当然，在德国学术界中，同情阿多诺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和内格特（Oskar Negt）。然而无论是就成就还是就影响而言，他们都无法与哈贝马斯比肩。因此，阿多诺的失势是难以避免的。

二 英语世界里的阿多诺及其理论

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批判理论主要指的是定居在那里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和洛文塔尔等人的学说。显然，当时美国新左派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马尔库塞等人，而不是来自阿多诺和本雅明。当然，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和《单面人》为美国人20世纪70年代期间接受阿多诺的更加复杂的理论铺好了路。但是，正如马丁·杰伊所表明的，阿多诺的著

^① Honneth, “The Social Dynamics of Disrespect: Situat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in *Habermas: A Critical Reader*, ed. Peter Dews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 323.

作在美国的接受与整合是一个缓慢而不平稳的过程^①。有意思的是，阿多诺在美国的命运，依然深受哈贝马斯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末，阿多诺、本雅明和早期哈贝马斯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加强而被整合进美国的学术讨论中。这些作者的抵抗性与批判性力量被直接指向新批评的形式主义偏爱以及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当时强调的显然是边缘性社会群体所实施的激进介入。詹明信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中表达了这一关怀。到了20世纪70年代，集结在《终极目的》（*Telos*）和《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这两份杂志周围的左派阵营开始对披着法国结构主义外衣的新“正统”进行了无情的攻击，他们有时暗中、有时则公开地依赖于法兰克福学派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通过严格强调马克思作品中的批判性和颠覆性因素，才能够将他从第三国际的沉重压力之下拯救出来。在这种语境下，批判理论充当了破坏物化教条的武器。但是，就此而言，甚至连法兰克福学派都不具有足够的批判性，尤其是阿多诺的理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界开始偏向哈贝马斯。有人甚至认为：“在美国，哈贝马斯作为一个思想大师而备受尊崇，其充分的理由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被看作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左派社会理论哲学体系。”^②

美国学界扬哈抑阿的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是显而易见的。保罗·皮康（Paul Piccone）在《法兰克福学派基本读物》（1978）的序言中强调，必须按批判理论的精神对批判理论进行

^① Martin Jay, “Adorno and America”, in his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1986), pp. 120–137.

^② W. Schirmacher, “Introduction”, trans. Virginia Cutrufelli, in *German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The Frankfurt School*, ed. Wolfgang Schirmach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0), p. xix.

批判。在他看来，批判理论的失败与《启蒙辩证法》的关键缺陷有关，这一缺陷就是它没有能力从具体的历史术语出发来分析阐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问题^①。在这个语境下，《终极目的》杂志许多年来一直支持哈贝马斯版的批判理论，因为后者《合法化危机》（1973）似乎提供了皮康在其序言中所勾勒的分析模式。在众多支持哈贝马斯的美国学者当中，《交往行动理论》的英译者托玛斯·麦卡希^②明确表示，哈贝马斯的理论通过揭示那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毫无批判地接受过来的韦伯的社会学模式的决定论，纠正并超越了老派法兰克福学派。有意思的是，麦卡希的序言只是略为提了一下哈贝马斯早期的著作。相反，理查德·伯恩斯坦在《哈贝马斯与现代性》^③（1985）的序言中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因为他从哈贝马斯的早期经验入手。然而，他的说法同样强调“成熟的”著作以及合理性/现代性问题。与麦卡希不无相似，伯恩斯坦认为，首先在卢卡奇，后来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中重新浮现的未获得解决的合理性问题（即韦伯的现代社会铁笼）使哈贝马斯超越老派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将克服《启蒙辩证法》的困境。对于伯恩斯坦以及北美的哈贝马斯派学者——包括麦卡希与赛拉·本哈碧（Seyla Benhabib）——来说，对理性与现代性的合理性捍卫是可能的，也是极为必要的。就这样，批判理论与一种超越了工具合理性的合理性概念结合起来了。同样，在佩里·安德森的著作中

① Paul Piccon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ed. Andrew Arato and Eike Gebhardt (New York, 1978), p. xvi.

② Thomas McCarthy,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in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Boston, 1984), pp. v—xxxvii.

③ Richard J. Bernstein, ed., *Habermas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85).